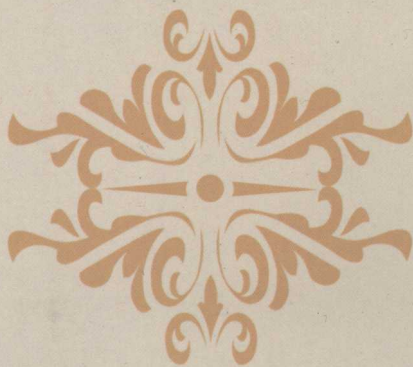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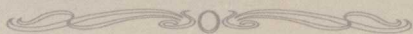
T E S E X U E K E X I L I E

近代中国社会研究

杨国强·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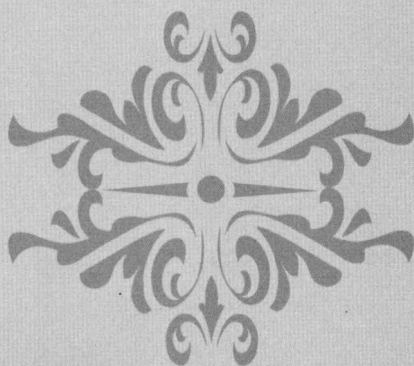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T E S E X U E K E X I L I E

近代中国社会研究

杨国强·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社会研究/杨国强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80745 - 253 - 9

I. 近… II. 杨… III. 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5032 号

近代中国社会研究

主 编: 杨国强

责任编辑: 言 孙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253 - 9/K · 041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 崇 喜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 1958 年。半个世纪以来,全院科研人员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为使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们审时度势,明确定位,提出把上海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目标,以此为导向,切实推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和科研水平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

社科院 50 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伊始就以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为各项工作的重心。我院的科研人员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积极投入对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1959 年 4 月,经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议,在上海召开了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为主题的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为此,经济所成立了三个调查组,兵分三路同时开展社会调查,写出了 11 万字的 6 个调查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记载了有关价值规律作用的许多生动资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61 年,姚耐、雍文远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出版,它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前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发行量达 20 多万册。

在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我院的科研人员也做了大量工作。1958 年 9 月,由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编撰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 10 月,《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新闻日报》及国外学术刊物对此作出了积极的评价。1958 年以后,历史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行为罪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戊戌变法史论

丛》等相继问世。这些珍贵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为60年代初期全国史学界共同促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重建。广大科研人员焕发出极大的科研热情,他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牢牢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主题,全力服务于全国和上海的发展,在基础理论和现实应用两大领域着力突破,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都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成果。

学科是孕育学术杰出人才的摇篮。这里仅以经济学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两个学科的发展为例加以说明: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1980年,陈敏之提出住宅是商品的观点,为后来房地产市场的兴起和福利分房制度的改革作了最初的理论准备。1985年,雍文远主持的国家课题“社会必要产品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体系创新和理论深化。这两项成果都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此外,部门经济研究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198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建立和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建议》。1983年,部门经济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得出重要的研究结论:(1)上海城市经济必须从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向多功能方向转变;(2)上海工业发展必须由拼设备向依靠高技术进步的方向转变;(3)在产业结构方面,必须从优先发展工业向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转变。90年代初,姚锡棠等参与开发浦东研究的学者提出:浦东应建设成为既有金融贸易中心,又有先进制造业的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在尽量发挥外滩作用的同时,要下决心把中央商务区特别是金融中心放在浦东的陆家嘴;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带动长江流域特别是长三角的发展。而18年来浦东和长三角的发展,正是印证了姚锡棠等人的战略判断。在这个基础之上,浦东新区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正在共同推进关于浦东改革“先行先试”的战略研究。

1991年11月,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正式成立。1993年2月,院党委决定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这是全国第一个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马上参与筹备中宣部1993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1994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在中央党校、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国防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组建的5个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地,要发挥骨干作用”,我院被列为全国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这一理论确立和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五大基地之一。

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共同发挥基础理论与 应用研究在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中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是对我院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根本要求,也是我院学科建设应当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发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整体优势,努力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广阔领域,既重视和加强原有基础理论研究,又鼓励和扶植新的学科增长点,我院于2002年正式确定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经济刑法、上海城市史研究、思想文化、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等8个重点学科,集中一定的资源推动这些学科的建设。2006年,我院的重点学科增加到12个,除原有的8个以外,还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城市文化、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同时,批准了14个特色学科,分别是: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文化创意产业,家庭学,租界、租借地等特殊地区研究,犹太学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西方文学文化批评思潮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经济伦理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学术思潮史,科学哲学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城市化研究。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的设置,体现了我院在学科定位、科研理念、科研体制和科研方法上的创新和探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在发生的转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要求。

近几年来,我院学科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一方面为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重要观点、思想和方法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咨询和服务,许多好的政策建议都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和新智库建设正在形成新的良性互动关系。

其实,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既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也离不开应用对策的系统研究。我院学科建设和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新智库的重要基础。没有学科建设和创新,就不会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创新,新智库建设也就不会有活水之源。事实已经证明,大量的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定是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否则就不会有科学性,不会有说服力。因此,在推进新智库建设中,我们必须要以学科建设为重要抓手,通过促进学科发展,为智库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人才服

务,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和知识服务。当前,我院学科建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发展形势,我们应当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适应党和政府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努力从如下几方面着手,加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力度。

一是以促进学科建设夯实研究基础,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基础和科研学术能力是我们的立院之本,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根本所在。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鼓励研究人员以学科发展为载体,扎扎实实做好基础理论的研究,推动基础理论创新。

二是以促进学科建设提升决策咨询研究和智库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学科建设是提升决策咨询研究能力和水平的基础。我们鼓励科研人员在开展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申请和承担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以学科发展带动决策咨询研究。

三是以促进学科建设培养和开发智库型人才。科研人才是我们的建院之本,智库型人才则是我们建设智库能力之本。我们通过学科建设带动学术团队成长,一方面注重发挥研究者的个体主动性、创造性,同时更注重推动不同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团队研究。我们要充分利用社科院多学科的优势,积极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交叉融合,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集中反映了我院重点学科、特色学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功力扎实的理论分析,也有思想敏锐的真知灼见;有基础雄厚的体系构建,也有匠心独具的新颖见解;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对现实问题的追踪。通过这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成果的展示,我们可以感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不断求索的敬业精神,同时也印证了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特别是上海的发展和繁荣。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我院的学科建设一定会为新智库的发展做出更好更多的贡献。

2008年6月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序 言

杨国强

五十年来,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人物和群类始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学术重心之一。由此累积起来的几代历史学家的思想劳动和产生于其间的著作、论文和历史资料的汇辑,都显示了历史所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所作出的可以计量的贡献。就历史的承接和延续而言,“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之能够成为一个学科,正是由这个过程而来,并以这个过程为前提的。因此,我们今日所做的工作都是与众多前辈学人已经付出的光阴和心血分割不开的。

自200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立“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为“特色学科”,至今已有五年。五年里本学科承担并正在从事于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清史·通纪》第七卷的编写,以及国家课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和院课题若干;先后出版了《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杨国强著)、《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徘徊——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杨国强著)、《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张剑著)、《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张剑著)、《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其后果: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马军著)、《湘军——成就书生勋业的“民兵”》(李志茗著)等8种著作,以及相关论文多篇。其中《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杨国强)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张剑)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

罗举这些名目,是时下考核学术,用来结账的尺度皆以数量化、标准化与格式化为通则,而尤以课题与奖项为大端。身在此中,遂不能不以通则为法则。然而就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这一类可供核算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主要的。在我的心中,“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与通常意义上的项目是不一样的。一个真正的学科,除了出著作出论文,除了承接课题获得奖项,更能寄托长远,从而更值得用心用力的,恐怕还是造就一点人才。有了后来一辈的人才,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著作、论文、课题、奖项,若由著作、论文、课题、奖项再深入一层,则是有了后来一辈的

人才,这个学科才可能延续于不竭不衰之中。然而时当学术成果数量化和格式化之日,用心用力于造就人才,其间的种种工作却是没有办法数量化和格式化,并因之而没有办法计量的。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有时我也自问自己在做的论学、讲学、释疑、纠错、讨论、示范是不是与经济学上的理性人离得太远,是不是有点自讨苦吃?有此游移而终究仍在“好为人师”,如同学术上的传教士,是因为历史所的青年一代里有一种执著的向学之忱,一种不计功利的耐苦耐劳,使人不能不被感动。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我常常想起自己已经过去了的青年时代,并畅想历史所的将来和我们这个学科的将来。因此造就与期待是连在一起的。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本书的五位作者都择自以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为专业而年辈较小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涉及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力求表达创见。就他们选择的题目所内含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其间不会没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只要以创见为心愿而力求自得之见,不成熟一定会变为成熟。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们也会这样走过来。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序 言 / 杨国强 / 1

晚清幕府的发轫

——以陶澍幕府为中心 / 李志茗 / 1

后科举时代的清末社会

——阶层、权力运行及社会生活的变迁 / 沈 洁 / 53

外贸埠际转运与上海经济发展 / 唐巧天 / 111

“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 何方显 / 165

《新青年》的启蒙与五四时期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动 / 冯志阳 / 210

后 记 / 244

晚清幕府的发轫

——以陶澍幕府为中心

李志茗

引言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幕府最为繁荣的朝代之一，自清初起，从知县到督抚，地方各级行政长官都辟有幕府，延聘人才为自己处理行政事务。这些人才被称作幕友、幕客、幕宾等，是地方长官自掏腰包、用隆重的仪式聘请来的，主要从事刑名、钱粮、文书等事务性工作。尤其前两者关系民生，更是官员考成的要目，必须具备专门的业务能力方可胜任，所以欲就此二幕席，事先需要拜师学习，待学成后方可出来应聘。然而，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会因应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当康雍乾百年盛世过去之后，地方积弊纷纷化为吏治民生中的时病，作为代表中央执掌一方军政、民政大权的督抚所须应对的事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于是其幕府人员的来源、构成，其幕府的规模、职能以及佐幕的义法都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种新的幕府形态，姑称之为晚清幕府。

晚清幕府发轫于嘉庆、道光年间。其时清王朝盛世光泽被剥尽，露出了内里的蛀洞和朽烂，民变纷乘，财政困难，吏治腐败，世风日下。面对这种疲敝的政局，嘉庆、道光皇帝也很想有所作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治理整顿，然而收效甚微，原因就是执行力很差，有令不行。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弊病自然比比皆是，尤其原已千疮百孔的盐法、河工、漕运三大政更是日见羸羸，腐败甚深，已到了不能不痛加整饬的地步。当时通达世务的督抚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均具经世意识，关心国势民瘼，致力于解决盐、河、漕诸大政。因此，他们特意延请“善经世之略”的人才入幕，帮助自己出谋划策，推行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幕府才得以经世幕府闻名于时，开创晚清幕府先声。

本文拟以陶澍幕府为中心，通过探讨陶澍幕府出现之背景及其运作过程，揭示

其示范意义和积极影响,进而厘清作为一种在近代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行政制度——晚清幕府制度究竟是怎么生成的,有哪些新的特征,又将如何演进。

一 “四海变秋气”——晚清幕府生成的社会历史环境

任何制度的形成并非人为的刻意为之,而是积之以渐,“顺乎社会之演进,应乎现实之需要而成长”^①。作为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幕府形态,晚清幕府的应时而生是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是由陷入窘境、危机深重的清中叶政局所造就的。

(一) 清王朝的中衰

清王朝入关以后,经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励精图治,苦心经营,海内一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府库充盈,边疆稳固,版图辽阔,呈现出一番兴旺景象。至乾隆时期,清朝国势臻于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成为当时亚洲最强盛的国家。日中则昃,物极必反。根据自然规律和辩证法原理,任何事物发展到巅峰状态时,等待它的必然是下坡路。然而,乾隆皇帝似乎并不懂得这个简单道理。他在造就有清一代繁盛局面的同时,日益骄奢荒纵,铺张扬厉。他又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宠爱亲信,听任他们胡作非为,上下征利,致使吏治腐败,朝纲崩坏,民乱渐起,国势一天不如一天。自乾隆中后期起,清王朝逐渐由盛转衰,表现在:

1. 社会动荡,内乱频仍。这是因人口激增所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清朝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后,取消了对丁口的赋役课征,使在历代都占国家税收收入重要部分的人口税不复存在了。于是,百姓不用再为偷税漏税而隐瞒户口或减少人口的繁衍。这样,由于缺乏约束机制,人口的繁殖就大大加快了。据统计,清初全国人口大约在6000万,而到康熙后期,已突破1亿,至乾隆末年竟猛增到了3亿以上,而道光十四年(1834),更是超过了4亿。^②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就增加了6倍多,这远远超出了当时生产力所能承受的程度,必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首先,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致使粮荒严重,米价不断上涨,进而引

① 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台北人事月刊社1971年版,第1页。

②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发了一系列问题。乾隆年间,粮食短缺已成为全国性问题,就连产米之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6省也出现了粮食不敷现象。粮食短缺,自然粮价也随之上涨。于是,哄抢粮食事件时有发生,灾荒之年尤其严重。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山西大同干旱,饥民合伙抢大户,每天都有几十家被抢者呈禀官府。^①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清政府疲于应付,焦头烂额。为解决粮食不足问题,它乃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并奖励百姓垦殖。然而,百姓围淤促田,毁林开荒,过度掠夺地力,使农业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又导致了天灾人祸的肆虐,引起新一轮的灾难。^②

其次,人民生活入不敷出,日益贫困。“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③,全国各阶层的人民都处于贫困状态。而农民的生存境况尤为悲惨。“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④为什么会这样呢?乾嘉时期的学者洪亮吉一针见血地指出是由于人口激增、物价上涨、劳动力贬值的缘故。“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⑤,这就注定了他们“终岁勤勤,毕生皇皇”的人生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清中期以后民变纷起,与此不无关系。

第三,由于人口过多,无地可耕,无业可就,移民、游民大量涌现,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自清初到嘉道年间,共形成三次人口西迁的高潮,其结果是连偏僻的边远地区或山区,也人满为患。“舍沃壤而趋硁土,伐木栖山,刀耕火种,岂其情哉?特以生齿日繁,口分之田,豪强兼并。”^⑥移民是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的,可是迁居地也不是什么皇道乐土,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他们走投无路,只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发动起义。嘉庆初年,以川楚陕地区的移民为主体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其中的最著者。起义历时九年,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游民问题也日益严重。据龚自珍揭露,“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狽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

① 汪志伊:《荒政辑要附论六条》,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第1486页。

② 详见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5页。

③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

④ 章谦:《备荒通论(上)》,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第1391页。

⑤ 《洪亮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页。

⑥ 《洵阳县志》,转引自杨国强:《百年嬗蜕》,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页。

之人,十将五六”^①。游民居无定所,漂泊不定,往往把参加会党当作谋食的手段,使得大小、形形色色的会党遍布全国,无处不在。据统计,自乾、嘉年间至清末,各种各样的会党名目竟有三四百种之多,武装暴动次数至少在千次以上。^② 会党风起云涌,使清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给清王朝带来巨大的威胁和灾难。清政府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力严重受损。

2. 库存银减少,财政收不抵支,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中。清朝入关以后,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岁有节余,库存日益充裕,不断增多。据统计,康熙十八年(1679)库存银为5 000余万两,雍正年间增至6 000多万两,而乾隆朝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以降,经常保持在7 000万两以上,其中,乾隆四十二年(1777)更高达8 182万余两,成为清代历朝库存最多的一年。^③ 然而,正是由于库存充足,天下太平,乾隆皇帝志得意满,不可一世,滋生出自大自傲情绪和奢侈浪费恶习。他穷兵黩武,增加兵额,大兴土木,南巡游幸,使财政支出大增,库存逐年减少,^④到嘉庆二年(1797)只剩下2 791多万两。而嘉庆朝因内乱频仍,军费开支猛增,库存更少,至嘉庆十九年(1814)仅为1 240万两。道光前期稍见好转,从元年——十四年(1821—1834),平均每年的库存为2 716多万两;后期则每况愈下,道光二十三年(1843)只有993多万两,三十年(1850)为800万两。

乾隆末年以后,清朝的库存银之所以越来越少,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临时性支出不断增多。所谓临时性支出是指清王朝正常岁出之外的开支,多用于应付突发或偶发事件,如战争、平乱、灾荒、治河等。清中叶以后,此类事件特别多,用度浩繁。战争方面,乾隆朝“十全武功”军费1.5亿两,道光朝鸦片战争军费1 000多万两,赔款2 100万两,共耗资1.8亿两银子。平乱方面,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等,花费2.1亿两白银,道光朝平定回疆叛乱用去1 800多万两,总计2.2亿两多。办理赈务方面,自乾隆中期至道光朝,共达几千万两之多。治河方面,不仅常经费增多,而且临时费用也不少。清代前期,每年的河工费60万两左右,到嘉庆中期后,“驯增百六十万”^⑤;嘉庆时,南河工费“止一百余万”,道光末已“递增至三百六十万”^⑥。以上是常经费增多的情况。而临时性的治河费,乾

① 《龚自珍全集》,第106页。

② 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第69页。

③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年版,第3页;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④ 具体参阅萧一山:《清代通史》(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1—241页。

⑤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93页。

⑥ 王庆云:《石渠余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隆末年以来,“大率兴一次大工,多者千余万,少亦数百万”^①。由上可以看出清中叶以后,临时性的开支是十分惊人的,光战争和平乱两项就相当于清朝 10 年的财政支出。凭空多了如此巨额的负担,库存焉得不锐减?

其次,财政盈余一年不如一年,呈下降趋势。详见下表。从表中不难看出,乾隆末年以后,清朝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收入逐年递减,而支出则逐年攀升,因此,其财政盈余越来越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呢?原因有两方面:其一,物价上涨,财政支出费用增多。1807 年,嘉庆帝在一份治河费清单上批示道:“近年大工屡兴,物产昂贵,一切工料不能悉照旧价办理,……所有单内增添价值,著较旧价多半倍、一倍、一倍半以及两倍,均照所议办理。”^②由此可见物价上涨使岁出增多之一斑了。其二,各省年年拖欠应解交中央的赋税,影响了岁入问题。据清查,自嘉庆二年至八年(1797—1803),直隶积欠银 340 万两,米 14 万余石;山东新旧亏欠达 600 多万两,而其他各省从数万两到数百万两不等。^③道光十九年(1839)各省拖欠达 2 940 余万两,二十八年(1848)又积欠 2 390 万两。^④不难看出嘉道两朝的钱粮亏空是非常严重的,岁入遂因此大打折扣。

表 1 清朝乾嘉道三朝财政收支表

单位:万两

年 份	岁 入	岁 出	盈 余
乾隆五十六年(1791)	4 359	3 177	1 182
嘉庆十七年(1812)	4 013	3 510	503
道光二十年(1840)	3 903	3 580	323
道光二十一年(1841)	3 859	3 734	125

资料来源:《清史稿》,第 3703—3704 页;王庆云:《石渠余纪》,第 144—145 页;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 页。

第三,官吏侵吞国帑现象越演越烈。由于清代实行低薪制度,官吏贪污问题自康熙以来就一直比较突出。期间,经过雍正帝的严厉整肃,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乾隆中期以后又日趋严重,尤其地方官贪污公款十分猖獗。乾隆四十六年(1781)查出甘肃官吏侵粮冒赈案,涉案官员,自巡抚、布政使以至道府、州县,凡 70 余名,被处死的不下 30 人。其中,主犯布政使王亶望胆大妄为,贪污数额之巨,使乾隆帝也

① 《清史稿》,第 3710 页。另外,本段数字也都来自该书第 3709—3712 页。特此说明。

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908《河工·物料二》,光绪十二年(1886)石印本。

③ 同注①,第 3538 页。

④ 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8 页。

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以前虽有贪赃枉法之人,“然尚未至侵蚀灾粮,冒销国帑至数十万金,如王亶望之明目张胆,肆行无忌者”。因此,王氏被率先抄家问斩。然而,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又发生了闽浙总督陈辉祖“将查出王亶望金子发交属员,换易银两,及隐匿玉器,抽换朝珠等事”。陈以侵盗官物罪,被赐自尽。此后,又陆续查出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句容书吏侵盗粮草、高邮粮书私印冒征等案,侵渔数额动辄数十百万,为前代所罕有。^①嘉道时期,贪污之风更盛,较乾隆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各级官吏利用职务之便,或招权纳贿,或卖官鬻爵,或冒领冒销库银,或贪污吞蚀公款,无所不用其极。嘉庆年间,除了查办和珅案外,还查办了直隶司书假印舞弊案、单幅昌冒赈案、广兴贪赃案等大案要案。道光朝侵吞公帑,中饱私囊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其中以道光二十三年(1843)查出的库银盗窃案最为著名。户部银库管库官吏监守自盗,竟先后盗出库银 925 万多两。随着国帑被大量侵贪,岁入和库存必然受到削弱,再加上临时性支出的增多和财政盈余的减少,我们可以想象嘉道时期的财政窘况。财政拮据是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之一。

3. 军队孱弱,武备废弛。清代的正规军分为八旗兵、绿营两种。前者约 20 万,后者约 60 万,总兵力达 80 万人。在清初,它们四处征伐,统一中原,平定内乱,抵抗侵略,为清王朝攘外安内、拓疆扩土,稳固政权,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随着大规模用兵的结束和清朝军制的确立,清军逐渐腐败,弊端丛生。八旗入关后,清政府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不仅粮饷额高于绿营兵,而且每人另有 30 亩的旗地。可是,生活上的特殊照顾,反使他们养尊处优,骄奢淫逸。一方面,他们挥霍无度,不知节俭,日益穷困;另一方面,他们“习尚日漓,往往竟繁文而轻骑射”^②,致使朝廷招募八旗兵丁时,更多的是从解决他们的生计出发。“各都统等于挑选披甲时,往往计及兵丁家口,并不视弓箭之优劣为去取。”^③这就造成八旗兵的素质下降,战斗力大为削弱。三藩叛乱时,驻守荆州的八旗兵一听到吴三桂进军的消息,就胆战心惊,埋大炮于土中,先行退却,全无以前那种强悍勇猛的威风。而京营八旗就更为腐败,他们“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一副公子哥儿做派,完全不像当兵的。嘉庆四年(1799),经略勒保就上奏批评说:“健锐、火器两营,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距达州七十里地,行二日方至”,要求将他们全撤回京,以免“为绿营所轻视”。^④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二),第 218—222 页。

② 《清实录·宣宗实录(五)》,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78 页。

③ 《清实录·宣宗实录(三)》,第 1072 页。

④ 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二),第 228 页。

其实,绿营兵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们虽在三藩乱后代八旗而兴,但到乾隆后期兵将腐化、作战能力下降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在两次金川战役中更是暴露无遗。领兵大臣在军营中饮酒作乐,指挥不力,连吃败仗。而士兵们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毫无斗志可言。因此,嘉庆以后,为镇压农民和会党起义,就不得不招募乡勇。遇有战斗,往往乡勇在前,绿营兵则龟缩其后,完全丧失了冲锋陷阵的勇气。绿营的孱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与军制有关。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考虑,清王朝分散绿营主力,将之变成一支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的军队,布防遍撒全国各地,每一汛地驻兵数名、十数名、数十名不等。这些士兵普遍携带家眷居住,除操演值勤外,平时生活与一般百姓无异。^① 部队规模小,训练松弛,军营生活又散漫,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其次,源自军官的搜刮。军官克扣军饷,中饱私囊,使原本收入微薄的士兵更加拮据,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只得另谋出路,“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藉资事蓄”^②,等而下之的则收受贿赂,敲诈勒索,祸国害民。当兵以赚钱为首务,又如何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呢?第三,军队素质下降。兵户多以家中的幼弱之丁应征入伍,兵源极不理想。而在军营中,他们或游手恣睢,或供军官役使,或从事“第二职业”,“所谓训练操防,全属有名无实”^③。正是由于平时不事训练,所以,临战时,他们缩手缩脚,畏惧打战,“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④。绿营同八旗一样,已经腐朽不堪,他们除了扰民以外,没什么战斗力可言。

嘉道时期,清军不仅仅将儒兵疲,军纪涣散,他们的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仍停留在清初的水平上,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冷兵器主要沿用传统的刀、矛、斧、戟、枪以及弓箭等十八般武器。而所谓的热兵器有鸟枪、火炮等,系仿造明代引进的“佛郎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火器样式制造的,可以说是清朝自制的老式“洋枪洋炮”,与这时期西方的枪炮相比,整整落后了200余年。可就在如此落伍的火器中,还不乏老掉牙货色。火炮锈迹斑斑,清初铸造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是明朝遗物;鸟枪使用几十年是常事,更有使用166年尚未更换者。至于火药也是明末的配方,因含硝量过高,制造工艺粗糙,不能充分燃烧,爆炸力很低。^⑤ 可见,清军的武器装备是十分陈旧低劣的,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制约着其战斗力的发挥。武

①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3页。

②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9页。

③ 《清实录·仁宗实录(一)》,第424页。

④ 李瀚章编:《曾国藩全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⑤ 详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34—38页。